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民族语文研究参考资料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

一九七七年二月

说 明

《民族语文研究参考资料》是把我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工作人员选译的一部分国外有关语言著述汇编而成的内部资料。所收资料，一般都出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免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在这里只按原文译出，没有加以评论。因此，希望阅读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对待。

现在印出的是第一辑。以后当视工作情况，陆续汇编付印，以供参考。

由于我们见到的资料有限，水平不高，选题也不一定合乎需要，译文不妥之处，请同志们读后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改进。

民族研究所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室

目 录

- 《阿尔泰语言研究》俄译本绪言 [苏] H·巴斯卡科夫(1)
- Дж.克洛森关于阿尔泰语学的著作 [苏] A·M·谢尔巴克(15)
- 通古斯—满语 [苏] O·П·苏尼克(25)
- 论通古斯—满语的词干和词尾的类型 [苏] O·П·苏尼克(69)
- 蒙古语中突厥语词的构拟 [苏] G·D·桑席耶夫(97)
- 原始蒙古语元音的长度 [日] 服部四郎(105)
- 关于元音和辅音和谐的描写 [美] 西奥多·M·莱特纳(123)
- 现代蒙古标准语词的语音 [美] D·G·斯图亚特
[美] M·M·哈勒陶德(131)
- 日本语口语句法研究 [美] 伯纳德·布洛克(177)

《阿尔泰语言研究》俄译本绪言*

〔苏〕H·巴斯卡科夫

B·科特维奇的《阿尔泰语言研究》一书曾于1953年在克拉科夫以波兰文在《东方学年刊》上发表过^①，这本书的出版是翻译外国阿尔泰学家和突厥学家在阿尔泰^②和突厥^③历史比较语言学方面著作丛书的继续。从事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研究的广大苏联语言学家对出版这本书很感兴趣。

弗拉基斯拉夫·柳德维科维奇·科特维奇（Владислав Людвикович Котвич）（1872年3月20日——1944年10月3日），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波兰科学院（Polskiej Akademii Umiejętności），院士，利沃夫大学（Uniwersytetu Jana Kazimierza）教授——蒙古语学和阿尔泰语学领域的大研究家。

他于1891年进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在当时大教授C.格奥尔基耶夫斯基、Д.佩休罗夫、А.伊万诺夫斯基、B.瓦西里耶夫、K.戈勒斯章斯基、A.波兹德涅耶夫和其他人的领导下进行研究。1895年在该校远东语言——汉、满、蒙古语言专业毕业。

从1896年起到1924年止，科特维奇从事紧张的科学的研究和教育工作，先后在东方语言系（到1919年以前）、社会科学系、彼得格勒的东西方语言文学历史比较研究所以及较后

在列宁格勒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是列宁格勒东方现代语言学院的组织者之一，任该院第一任院长直到1924年。

1924年科特维奇当选为亚纳·卡齐米尔利沃夫大学远东语文学教研室主任，以后是克拉科夫波兰科学院院士，因而也就由苏联移居波兰。

科特维奇由于编著蒙古语语法讲义^①，早在1902年就开始在阿尔泰学历史比较领域从事研究，以后并继之以许多其他的较晚的专著和评论，内容包括历史比较研究漫笔和将蒙古语和其他阿尔泰语言进行对比。然而科特维奇在阿尔泰语言历史比较研究方面的综合专著集则开始于1931年出版的《阿尔泰学探讨》第一卷^②——词汇—语法性质的著作。这些著作论述：1) 阿尔泰语言比较研究一般方法引论(第一章)；2) 数词(第二章)；表示颜色名称的形容词(第三章)。

这些探讨的出版继续到1932年，奠定了由两部分组成的阿尔泰学研究的新的词汇集的始基，其中第一部分论述了关于为驿站服务的术语；第二部分论述封建社会的封号，突厥语：bäg，蒙古语：begi 和满语：beile^③。

最初的词汇语法集在1936年又补充了新的出版物^④。新出版物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以前三章的补充(第四章)，第二部分是对静词词缀-n的专题分析(第五章)。

科特维奇的一些其他著作和评论中也有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和比较词汇方面的大量材料，其中有关于突厥——蒙古语的类比和这些语言相互关系的著作^⑤。

然而应该认为科特维奇的主要著作《*Studia nad językami altajskimi*》(《阿尔泰语言研究》)，是他在阿尔泰学方面的

所有研究的总结。该书的译文就收在本书中。《阿尔泰语言研究》是科特维奇去世后的刊本，是由科特维奇最亲近的学生之一，已故的蒙古学家马里安·列维茨基整理；他在著作前面写了篇幅很大的绪言并且列了科特维奇著作的目录。

科特维奇的《研究》（指《阿尔泰语言研究》——下同，译者）创立了理论性的概论，这里作者提到了阿尔泰学问题的历史和阿尔泰学的一般问题。概论非常充分地提供了关于突厥语和蒙古语词的结构，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满语静词和动词后缀的特点，关于词类、元音和谐以及阿尔泰学某些其他主要问题的知识。

著作的第二部分分为几章，主要论述阿尔泰语言的形态学。作者把所有的词分成三个语法类别——静词、动词和小词，分析附加在这些词类上的静词词缀、动词词缀和不同种类小词的构成方式；这里所说的小词，除了地道的小词外，还包括后置词和连词。在静词篇中，除去构词词缀之外，作者还详细研讨了包括领属词缀、谓语性词缀和格词缀的词形变化词缀。同样，在动词篇中除去动词构词词缀外，还有动词变位词缀。

作者不仅描述了词缀的意义，而且用突厥语、蒙古语、通古斯—满语的材料对这些词缀做了历史比较的分析，即确定了词缀的起源，引用了俄国和国外阿尔泰学家、突厥学家、蒙古学家和通古斯—满学家所有有关词缀起源的假设。

依据以往研究者的著作，作者在自己很有价值的著作中，既引用了所有阿尔泰语言都有的、也引用了只是阿尔泰语言个别语族才有的一切已知的语法词缀对应。

《研究》的特点是它的系统性，慎重的结语和论断；作

者所根据的只是可靠的、严格确立的语音规律。论述动词构词和词形变化的几章，其中有关于动词人称形式的知识，特别有意义。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满语的研究者在这里可以找到很多新材料和有意义的结论。

作者由于否认阿尔泰语言在起源上的共同性，而以类型一致及长期相互影响来说明其密切关系，因而未确立阿尔泰语言发展的任何共同规律，放弃重拟原始语和所有阿尔泰语言的共同基础语。

同时，科特维奇根据比较、对照和他所能得到的材料，在结语中确定蒙古语和突厥语之间类似的共同点在词法中约占50%，在词汇中约占25%，而在通古斯—满语同突厥、蒙古语之间，在词汇中约占10%，在词法中约占5%。

和断定这些语言在起源上有亲属关系的作品不同，表现和论证这些语言类型一致观点的科特维奇的著作同这方面的其他研究作品相比是最完备的，它根据丰富的实际材料并以比较对照分析的出色技巧为其特点。

阿尔泰语系的问题至今仍是有争论的、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不涉及以前曾为我们阐述过的阿尔泰学理论发展和阿尔泰学史料研究的一般问题^④，这里将只分析这一理论的主要派别，对照其主要代表者的研究方法和方式，其中也包括科特维奇和Г.И.拉姆斯杰特的在内，我们并顺便谈到有关对科特维奇这本书的一般评价的一些批评性的意见。

在现代阿尔泰学中有一些研究阿尔泰语言亲属关系的主要派别和方法，它们基于两种不同的理论：1) 阿尔泰语言在起源上有亲属关系的理论和2) 类型一致的理论。按照后一理论，阿尔泰语言由于经常接触和相互作用，同样使语

音、词汇和语法方面的材料具有共同性。

如果前一理论的表达者是E.Я.弗拉基米尔佐夫、E.Д.波利瓦诺夫和拉姆斯杰特，那末科特维奇就是后一理论的主要的代表者之一。

科特维奇的《阿尔泰语言研究》，不仅描述了阿尔泰语系主要语族——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满语之间的类似和差别的一般情况，同时也简明叙述了它们发展的一般过程。

科特维奇关于阿尔泰语言发展的理论的实质是：在很远的时代，纪元前若干世纪以前，在汉族以北居住着突厥、蒙古和通古斯—满族的一些部落，他们用各不相同但结构类似的语言谈话。在迁徙的过程中，这些部落的个别集团分化出来，孤立起来，而其语言在新底层的影响下，逐渐有了自己的特点。科特维奇认为属于这类孤立起来的人种集团有，比如，原始布加尔人和现代楚瓦什人的祖先，他们的语言在芬兰底层的影响下有了独有的特点；或者现代雅库特人的祖先，由于受到蒙古人和通古斯—满人相当大的影响，在他们的语言中也出现了独有的特点。

类似现象也出现在蒙古和通古斯—满的一些部落中。

因此，科特维奇认为不同语言的人种的时常迁徙和常常发生语言接触的事实，可以有把握的说明在蒙古语和满语中的突厥语借词，同样也可以说明这些语言对突厥语的相当大的影响。

然而科特维奇认为这样的假设也是可能的，即所有这三个语族在极古时代可能有统一的基础语，这样的基础语后来由于不同底层的影响而分化，形成三个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语族。

突厥、蒙古和满语在语音方面的颇为类似，极有力、极明显地证实了关于统一阿尔泰语系的想法，科特维奇也不否认这一想法的存在，但他要说明这一语系的形成是基于这些语言彼此之间类型的一致。

这样，无论是起源理论还是类型理论的代表者都同意阿尔泰语言的共同性是存在的，尽管他们对这一共同性的解释不同，从而也在研究实际材料的方法上有分歧。

拉姆斯杰特和科特维奇在分析阿尔泰语言的语言事实的方法上的区别在于，拉姆斯杰特利用突厥、蒙古和满语的话的事实来重拟原始形式，同时确定这些语言的语音结构和语法结构发展的规律性；可是科特维奇只应用分析一些语言从其他语言的词汇借用和语法借用的研究方法，根据与其他语言的关系来对比一语言的语音和语法发展规律的特点。

对所研究的事实的不同处理方法，决定着他们的著作的不同结构。如果可以把拉姆斯杰特的著作的特点说成大部分是样式纷繁的构词和构形词缀的独特的形态学词典，那末科特维奇的著作就是阿尔泰语言普通比较一对照语法理论的试作，这一语法具有一定的公式和反映这些语言整个语法结构的理论纲要。

把科特维奇的《研究》的特征描述为阿尔泰语言的普通语法，首先必须指出这是考虑到有关阿尔泰所有语族方面的大量专著。与许多外国阿尔泰学家的研究作品不同，科特维奇广泛利用苏联突厥学家、蒙古学家和通古斯—满学家的著作。由于充分利用科学上已知的事实和阿尔泰语系活的语言现象，科特维奇的著作有很多极有兴趣的意见和细致的观察。作者吸取的丰富的实际材料，使他可以导致许多有关词的

个别语法形式发展和其他现象发展的有意义的推论和假设。

例如，科特维奇关于突厥词根和同样的、但因末尾元音而复杂化了的蒙古词根相比较，是较古的短尾形式的理论是很有意思的和令人信服的。科特维奇关于在阿尔泰语言中的实词结构和词缀结构的假设是很值得注意的。

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在具体的阿尔泰语言中个别语法附加成分起源的很多有意义的、充分提出理论的假设。试比较，例如他的关于突厥带 -sa/-sā 的动词条件式和带 -yasaj/-gäsäj 的蒙古形式的共同起源的假设，或是关于突厥语和蒙古语中来自助动词命令式的某些祈使态词缀起源的假设，如 oqut- < oqu tā 《教》（直译：《教！——说》）等等。

科特维奇作出了许多有充分根据的、描述阿尔泰语言的一般结构和它们的句法构造以及反映阿尔泰语言句子和词组结构的形态附加成分特点的一些结论。如像他的关于来自形动词的动词所具有的大部分变位形式起源于形动词的原理，是极为可靠和大有效果的。这只要指出在突厥语中不是大多数，而是所有的动词变位形式都是起源于形动词的。这一理论的效果在于可以按新的方式着手对阿尔泰语言的句法进行历史—比较研究，说明这些语言中的句子结构和词组结构。

鉴于动词的谓语形式起源于形动词的理论，科特维奇指出在动词变位形式中，即在 *verbum finitum* 中不可能存在领属代词词缀。因此，所有人称谓语词缀——完整的和简缩的——无论是在古代语或现代语中都不能表示领属关系，它们具有明显的谓语性质，而领属的代词性词缀只是限定词组的特点。

然而所有的动词变位形式的形动词词于还不说明在阿尔

泰语言中变位的纯静词性质，这点作者曾多次指出。反之，作为动词派生形式的形动词乃是最完全的动词形式，因为只有它具备动词的所有标志并几表达动词特有的态、体、式和时的语法范畴。至少在突厥语中，只有形动词具有按人称变化的可能性，因为突厥语句子中（其中也包括用带有系词的静词来表达的所谓静词性谓语的句子中）的所有谓语，历史上都是起源于形动词形式，因为这些谓语中的系词，历史上乃是来自助动词 tur (< turur) 的形动词形式。

因此，突厥语中每个谓语不论是现实的还是重拟的都是动词的，而把突厥语中的变位的特点说成是静词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易于误解。

科特维奇大体正确地分析包括突厥语在内的阿尔泰语言结构时，也谈到某些有争论的方面。

作者十分正确地确定阿尔泰语言构词法和词形变化的界限，充分有把握地论证了属于词形变化范畴的只是领属范畴、变格（即格的范畴）和变位（即人称范畴）^⑩，同时他还使阿尔泰语言词的结构稍加简化，并且将词分解成基本结构要素，认为《词的成分中也可以是只有词根，也可以是包含词根和后缀……》^⑪。

同时，在最鲜明地表现了粘着法特点的阿尔泰语言中，词的结构较为复杂，像在突厥语中，包含一些不同构词词缀和构形词缀的词，一般可以分成四个基本成份或词素群：1) 词根，由表示词的主要的、实际意义的不能分解的词素组成；2) 词汇—语法构词词缀，可以改变词的词汇意义及确定它与词汇的其他词汇—语法类别的关系。它们与词根在一起组成词的第一词干，以确定构词的最后结果及最终确定词的词汇

意义；3)语法一功能构词后缀，它们确定词在词组或句子成分中的作用，和第一词干在一起组成词的第二词干以表示词组或句子的被限定成分或限定成分。最后，还有4)词形变化词缀，确定该词在词组和句子成分中的关系，即规定它在句中的功能——作主语、谓语、补语或是状语。

因此，阿尔泰语言中从词的词态学结构观点来看，词并不是词根和后缀的简单组合，而是具有严格指定的词汇和语法意义的词素的复杂组合。

关于许多突厥语词根的原始双音结构最初仿佛是由cr型（即元音和辅音）的两个音位组成的理论，科特维奇及其门生^⑫不是没有争议的。这一理论的拥护者通常援引古代书面（鄂尔浑、叶尼塞、古维吾尔）文献中出现过的数量有限的词根作证据，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许多极常遇到的crc型的三音词根也是晚期的词干，这种词干历史上起源于原始词根cr+词缀c的复杂组合。

的确，我们在《鲁尼》和古维吾尔字母（大家知道，这些字母不反映词的完全发音）书写的古奥古兹（鄂尔浑）、吉尔吉斯（叶尼塞）和古维吾尔的书面文献中，可以遇到由cr组成的词干，如ba-《捆》，sy-《拆毁、破坏》，sa-《认为、想》，tu-《堵住》，tū《不同的》，ta《数量、数目》，su《水》，bi《母马》，jä-，ji-《吃》，dä-，di-，tä-，ti-《说》，ja《弓、武器》，bu《这个》，nä，ni《东西》，ju-《洗》，以及甚至由一个元音(r)组成的词干，如：u《睡眠》，u-《能够》，o《他》，ö-《想》，ä-《在》，y《灌木丛》及其他。

然而，我们考虑到用古老的不完善的字母表（鲁尼，古

维吾尔的<粟特的甚至还有阿拉伯的>不能完善表达词的完全发音，以及考虑到保留在现代语言和方言中的同样根词的较古的发音形式，在比较仔细地审查这些根词时可以很容易确定，所有上述词根在收尾具有较完全的语音形式，通常在末尾带弱辅音，在语音发展过程中弱辅音或与前面的元音溶合组成长元音，或完全消失。带弱辅音(y、w、j、t、l、r、g)的短元音组变为长元音和随后将长元音变为短元音的过程也常常出现在现代活的突厥语中。

比如，谁都知道，像 ja《马(武器)》，su《水》，u-《能够》，ju-《洗》这样一些词根是起源于比较完全的发音形式 su^γ (吉尔吉斯语: sū) > 哈萨克语: suw > 新维吾尔语: suγ 可见，形式 su 对 suγ 来讲是比较晚的；ja《马(武器)》>阿勒泰语: dja > 阿巴克语: jaγ (维尔比茨基, 65)^⑩；u-《能够》> 土耳其语: uγ- 新维吾尔语: uq- 《懂》，uqum《知觉》；ju-《洗》< 吉尔吉斯语: ju- < 哈萨克语: zuw- < 阿巴坎语: jyγ- (维尔比茨基, 101)。经历同样语音发展过程的还有词根: sy-《拆毁、破坏》，历史上起源于 sŷ- (试比较，土库曼语: sŷn- 《被毁坏》) < 新维吾尔语: siq- 《压、压紧》，-yn- < *syγyn- 《被压，裂开，被压紧》(试比较维尔比茨基, 318页和320页: syγyn- / syn- 《紧贴墙》)；ba- 起源于 *baγ- (试比较马洛夫^⑪ 古代维吾尔语: baγ-yś 《帐篷的绳子、联系、连结》)。至于说到 baγ《带子》这个词，那末它历史上起源于带长元音的词干 (试比较，土库曼语: bāγ)，再远起源于 *baγ-yγ，最后由于音节的叠音脱落的省音而紧缩成 bāγ。这个形式我们也可以在现代土库曼语中遇到；而由词根 baγ《连结》派生的通常组成构词的词

形变化表：古代维吾尔语： $\text{ba}Y\text{-y}\check{s}$ 《绳子》； $\text{ba}Y\text{-y}\check{Y}>\text{b}\ddot{\text{a}}\text{Y}$ 《连结》， $\text{ba}Y\text{-y}\check{Y}\text{-ha-}>\text{ba}Y\text{-ha-}$ 《连接》。sa-《认为》，起源于 $\text{sa}Y\text{-}$ （试比较维尔比茨基 282，阿巴坎语： $\text{sa}Y\text{-yn}$ 《想，思考》， $\text{sa}Y\text{-y}\check{s}$ 《才智，思想》；试比较马洛夫 $\text{sa}Y\text{y}\check{s}$ 《算术，计算》），至于说到 san 《数》这个词，那它也是起源于带长元音的词干（试比较，土库曼语： $sān$ ），这一词干本身由较复杂的词干 $*\text{sa}Y\text{-yn}$ 构成，在这里词根的弱辅音和元音的组合 aYy 在土库曼语中变为长音。于是，由词干 $*\text{sa}Y\text{-}$ 《想，认为》还产生了派生的 $\text{sa}Y\text{y}\check{s}$ 《思考，计算》， $\text{sa}Y\text{y}\check{n}>\text{sān}$ 《数》， $\text{sa}Y\text{-y}\check{n}\text{-ha-}>\text{sān-la-}>\text{sān-na}>\text{sāna-}$ 《认为》。

我们可以在带有变体 tā- 《说，说了》带有变体 jā- 《吃，吃饭》类型的词根中看到一些另外的语音现象，在这类词根的末尾有收尾的 j ，即起源于词根 tāj- 《说》， jāj- 《吃》的完全型（试比较新维吾尔语的行为名词 tāj-iş 《说话》， jāj-iş 《吃的过程》和其他）。

这个理论的拥护者引用的所有双音《词根》一般在收尾或是具有元音音长，或是具有没证实的关于词根的原始双音性理论的派生的构词形式，试比如 $\ddot{o}-$ 《想》($>\text{ög-}$ ，MK^⑩) 和派生的 ög-üt 《安放》MK(453) 或吉尔吉斯语的 $\ddot{\text{ü}}\text{-üt}$ ； $nā$ 《东西》，(nej 《东西》MK(419)； bi 《母马》(哈萨克语： $bije$)； bu 《这个》(<卡拉卡普语： bul)， $\ddot{a}-$ 《在》(< ar 古突厥语)， to 《数量，数目》(<吉尔吉斯语： $tō$) 等等。

科特维奇在原始词根双音性的理论方面走得更远，认为象 tur- 《站，生活》， $\ddot{a}\text{r-}$ 《在》等这样的词不是原始词根，而是词根 tu- 和 $\ddot{a}-$ + 形动词词缀 $-r$ 的组合。尽管无论在古代语和现代语中都得不到证实。因为已经知道，由第一动词

tur-ur 和由第二（动词） *är-är* 来的带 *r* 形动词对古代语和现代语都是规范（对 *tur-ur* 来讲）。而且所有构词派生（词）都是来自词干 *tur-* 和 *är-*，而不是来自词干 *tu-* 和 *ä-*，试比较，例如 *turmuš*《生活》，*armiš*《曾有过》及其他。

可见，关于双音词根原始性的理论所提出的论证现在还是不够有力的。而这一理论的拥护者引用的所有例子中存在长元音的事实（如在土库曼语中）不是证实而是与事物的实际情况相矛盾并指出在某些语言中构成 *er* 类型词根的较为复杂的过程。

虽然有某些综合研究所不可避免的有争议的论点，但科特维奇的著作仍是现今阿尔泰学方面的主要的基本的科学著作之一。

作者在书中不仅引用相当大量的阿尔泰语言方面的事实材料，用比较一对比的观点说明它；而且还作出了有理论根据的阿尔泰语言语法提要，这个提要经作者的深思熟虑，确切反映了阿尔泰语言的结构。

科特维奇的著作无疑地将在今后研究中和解决阿尔泰语言起源的亲属关系问题，给予阿尔泰学家相当大的帮助。

*（良益译自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о алтайским языкам*，增益校）

* 题目是译者拟的。原题为《绪言》。见《阿尔泰语言研究》俄译本，第5页。

① W. Kotwicz, *Studia nad językami altajskimi*, RO, r. XVI, 1950, Kraków, 1953.

② Г. И. 拉姆斯杰特：《阿尔泰语言学引论》，M.，ИЛ，1957.

③ М. 里亚夏年：《突厥语历史语音学资料》，M.，ИЛ，1955.

④ В. 科特维奇：《蒙古语语法讲义》，大学生 Э. 茂林格和 Э. 别

连斯出版，CII6，1902年（石印版）。

⑦ W. Kotwicz, *Les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altaïques*, I (Notice Préliminaire), II (Les noms de nombre), III (Les noms de couleurs), RO, VI, 130—234页, Kraków, 1931.

⑧ W. Kotwicz,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altaïques*, A—B. CO, 1932; 补充和修改的第二版, RO, XII, Krakow, 1953, 325—368页。

⑨ W. Kotwicz,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altaïques* IV—V, RO, XII, Kraków, 1936.

⑩ W. Kotwicz, Z badań nad językami altajskimi: VI Zjazd orientalistów polskich, Wilno, 1937; W. Kotwicz, Kilka uwag o turecko-mongolskich analogiach językowych, VII Zjazd orientalistów polskich Kraków, 1938; W. Kotwicz, *Les éléments turcs dans la langue mandchoue*, "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XIV, 91—102页, 以及其他。

⑪ 参阅, Г.Н. 拉姆斯杰特:《阿尔泰语言学引论》一书的绪言, 5—20页。

⑫ 我们认为, 应该列入词形变化范畴的还有数的范畴, 因为后者表现阿尔泰语言句子主语、谓语的数的一致关系。

⑬ 见第30页。

⑭ Б.М. 尤努萨利耶夫:《吉尔吉斯词汇学》, I, 伏龙芝, 1959年, А. 扎伊昂科夫:《关于突厥语词根结构问题》, 《语言学问题》第二号, 莫斯科, 1961年。

⑮ B. 维尔比茨基:《突厥语阿勃泰和阿拉达格方言词典》, 哈山, 1884。

⑯ C. 马洛夫:《古代突厥语文献》,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51。

⑰ Mahmud-al-kaşgari Divanü lügat-it-türk tercümesi, Endeks yazan Besim Atalay, Ankara, 1943, 451页。

